

周 明 主编
刘 茵 姜强国 编选

历史在这里沉思

第六卷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太原

历史在这里沉思

周明 主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4.25 字数：35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ISBN 7-5378-0116-9

I·123 定价：5.60元

目 录

沧海

——邓小平1969—1973年在江西……………裘之倬(1)

我的囚徒是“一号”……………郭云梦(96)

怀念萧珊……………巴 金(125)

阿英的最后岁月……………吴泰昌(138)

向死者告慰

——记魏金枝……………王西彦(145)

乒乓启示录

——庄则栋在“文革”中……………关 鸣 黄伟康(165)

战马风骨

——郭兴福传奇……………杨 旭(275)

容国团之死……………全 汕(296)

但悲不见九州同

——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赵 瑜(305)

粉碎“四人帮”纪实……………丁 琪(414)

沧 海

——邓小平1969—1973年在江西

袁 之 伟

国庆盛典和深刻的反思

公元1984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这一天，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5周年。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数次的大小劫难，在她35周年的这天，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整个世界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翘首观望。

北京，这座凝结着共和国各种信息的首都，成了举世瞩目的核心。这里，将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规模盛大的阅兵式。

上午10点30分，阅兵式开始，一座绵延数里的钢铁长城，缓缓地、庄严地移向雄伟的天安门广场。手握钢枪，头戴钢盔，神态庄重，气宇轩昂，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的方阵，接受邓小平同志的检阅。陆军、空军、海军，一个个方阵，伴着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和发自肺腑的问候声走过天安门，走过邓小平的身旁。坦克方阵，隆隆地开过；大炮伸着长长的炮管，气势森严地开过；身躯庞大、摄人心魄的导弹在十轮大卡车牵引下显示出无敌的力量；飞机编队从头顶呼啸着掠过。这座钢铁的长城，塑造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巨人形象。世界为她震惊，中国为她振奋。邓小平同志在微笑，他微笑着踏上检阅车，向这些祖国的骄傲问候。他神态庄重，神采奕奕，检阅着一个个军兵种的队伍。每一个方阵

都向他举手敬礼，爆发出内心的呼喊：“向小平同志致敬！”小平同志亲切问候：“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这声音清晰、明亮，传到每一个战士的心中，于是方阵里又爆发出更强大的声音：“首长好！”“首长辛苦！”世界在为邓小平同志喝彩，为他的卓越智慧、强健的体魄喝彩；中国在为邓小平同志欢呼，为他制定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化”蓝图，为他的身体健康欢呼。

小平同志检阅部队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建国35周年讲话，小平同志宏亮的声音从天安门传到祖国大地，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35周年的建设，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了，举国上下一派欣欣向荣。这一次盛大的国庆军事检阅生动地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曾经在这座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又在这座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更加强大起来了。”

这意味深长的声音，打动着、振奋着多少中国人的心灵。

这一天，全国亿万双眼睛，在电视机荧屏前久久注视。在英雄城南昌的一座公寓内，有一群人，他们并非一家人，却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在主人家的电视机前。主人是退居二线的老厅长、中共江西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罗朋和夫人年丰同志，客人是陶端璿、缪发香、程红杏、黄文华等同志。他们象所有中国人一样尊敬爱戴小平同志，然而他们又比普通的中国人与小平同志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他们兴奋地交流着各自的情感，为小平同志健康的身体、开朗的笑容、智慧的谈吐由衷地高兴。他们相信，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他们是幸运者，他们的幸运是象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那样，为这位伟大的人物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他在黄

沙万里之中建立了一小块绿洲。绿洲虽小，却足以避开风沙的淫威，给人以休养生息的可能。唯有善良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才会如此欣慰。他们仿佛觉得，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江西三年的劳动生活中，那散步时的凝神思考，那正襟危坐时的沉默，与今天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明天的宏伟蓝图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黄文华，当年的管理警卫，暗中庆幸，当年，他未曾打断过这位伟人的思考。尽管自己在其他方面有过幼稚和鲁莽的行为，甚至讲过错话做过错事，至今为之内疚和惭愧。历史向后推十几年，当时的中国人谁也没有想象到今天的景象。小平同志是否想象出了呢。的确，他的脑海里装着与众不同的内容，跨越着时空的界限。也许，他没有想到。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的破坏面前，他想到的第一步是如何终止这场浩劫，他想到的是如何在逆境中生存下来，以便在将来重返工作岗位时，以扭转乾坤之手，把中国从浩劫中拯救出来。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指出：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情况作了错误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有各个方面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在内。那时，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张闻天、李立三、张霖之、刘仁、邓拓、吴晗、王世英等同志先后被迫害致死，使邓小平同志感觉到斗争的残酷，是人类的灾难。也许，在他深沉的思索中，他已经想到了今天，想到了历史赋予中国的进程。因为在他第二次重返工作岗位的时刻，便以自己的魄力和巨大的智慧强有力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当他第三次重返领导岗位，便有条不紊地进行一项项卓有成效的改革，制定一项又一项为中国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决策，推动着中国以世界惊奇的速度稳步向前，使得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流于一个名词或概念，而是一个具

体的、人人都在实行的工作。

当电视机的荧屏上出现了一幅标语，上书“小平您好”四个大字，围在电视机前的罗朋、年丰、程红杏、陶端璿、缪发香、黄文华禁不住鼓起掌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从狂热的个人崇拜中清醒过来，已不会盲从于他们不理解的事情，也不再以封建的口号向任何人表达自己的心意。“小平您好”却是一种蓄于人们心中、迟早要喊出来的心声。这些围坐在电视机前极度兴奋的特殊观众，各自品味着这四个字赋予的意义。他们是幸福的，幸福中带有一种劳累之后的轻松。历史曾赋予过他们一项使命，这项使命是在他们惊恐中赋予的，当他们在惊恐中执行它时，就出人意料地、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一件事的成功是多因素的协调配合造成的，倘使一个环节出了意外，成功便为失败所代替，事件的结果便要改写。人们在怀念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张闻天、李立三等同志时，不禁要为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欢呼，因为，历史向后推十几年，中国还是在灾难的海洋中，天空是如铅的黑云，回首往事，不寒而栗，唯其如此，善良的人才会有为他们永远不可摧毁的力量而感到欣慰和骄傲。

一号命令——

一个更为毒辣的阴谋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三年多，三年中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有多少家工厂陷于停产，有多少学校、单位陷于瘫痪，然而中国的政坛上却有着一批人，凭着对这场错误运动的推波助澜，凭着他们对这场毁灭性运动的投机引导，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阻拦他们向上爬的障碍，使得他们平步青云，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弄潮儿。这便是林彪、江

青反革命集团。尽管这场灾难的本身已给了他们需要满足的绝大部分欲望，毕竟，离登上最高的权力位置尚有咫尺之遥。这两个互为利用的反革命集团，在夺取一大部分的权力之后，又开始了夺取最高权力位置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本身，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灾难的开始。不幸，一大批为党为国耿耿忠心，对毛泽东同志无比信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失去毛泽东同志对他们的信任，从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被夺权，使得权力越来越集中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也使得毛泽东同志过多地依赖于这两个集团。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指出：“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一个是“最亲密的战友”，军队的副统帅；一个是“伟大的旗手”，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林彪凭着他在战场上几十年的厮杀，对形势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敏感，他话不多说，往往是抓到关键的地方。这三年，就凭着把毛主席著作缩为老三篇，随身带，天天读；“三忠于，四无限”；凭着不失时机地晃动语录本，一步登上党和军队接班人的宝座。但他并不满足这个，他清楚，被打倒的老师，被打倒的中央领导干部，是倒而不僵，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他的极大的威胁，他想到要尽快掌握最高权力，就必需利用一个更有利于他的形势。林彪乘毛泽东外出之机，签署了反动的“一号命令”，率先出了这“一支奇矢”。一号命令借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令全军处于随时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将一批批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在三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政治迫害。名曰“战备疏散”，实际上是把他们放到林彪死党控制的省份进行各种政治迫害和肉

体摧残，以达到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

中南海。邓小平家中。

当一号命令下达时，家中只有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培根。除被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尚在医院之中而外，其他四个子女，都下放在边远山区。仓促中被撵出北京，真是“风萧萧兮秋水寒，此去京城兮何日还”！邓小平心中翻动着苦涩的波涛。国家陷入灾难的动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其命运真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任风雨飘流了。回想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残酷打击，自己曾被发配到敌我交界的边远地区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当时与自己同时受迫害的毛泽覃、古柏同志在不久后的岁月中，便死于敌手。自己作为幸存者，作为执行毛泽东路线而被迫害的幸存者，今天，因为抵触这场文化大革命，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仓促中，命运之舟又将漂向何方？在首都乃至全国，打倒他的标语足以用铺天盖地形容，打倒他的口号其声浪抵得上山崩海啸，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又演化出对他的敌视。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提法具有真理的价值，这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肃清党内象他这样的人吗？年轻人对他的敌视，正是可以被人利用的武器。此刻离开京城到一个暴乱随时可以降临的省份去，看来这命运的小舟已不为自己掌握。在历史长河的某一特定时刻，一位能指挥百万雄师的统帅，可能不如一个狱卒更能掌握自己。这历史的风云，演绎出多少悲欢离合、啼笑皆非的故事。

总理的电话——

风浪中一只援助的巨手

党和国家在暴风骤雨中飘摇。

人民在凄风苦雨中磨难。

野心家在掀动一股股新的恶浪。此刻，有一双巨手在与邪恶的势力作最为杰出的抗争。这就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

当总理知道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一眼就看穿了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他一方面巧妙地将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告知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冒着风险，以合法身份给各地打电话，提醒他们要保护这一批老干部。1969年10月3日，总理给江西打了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长途电话。接话人是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秘书赵子昌同志。总理知道，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曾写过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文章动感情地描绘林彪简朴的生活，肉麻地吹捧林彪如何忠于毛主席和对毛主席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热情款待，用程世清后来的话来说，这是买了一张上林彪贼船的船票。此事足以说明他是紧跟林彪的，如不打招呼，有可能对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同志施加种种迫害，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1969年10月18日上午8时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即原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铃响了。

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这是来自北京中南海的长途电话，耳机传来熟悉的声音：“喂，你是程世清政委吗？”程惠远听到这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一猜便知道是周恩来总理。

“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我叫程惠远，是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程政委下乡去了。”

周总理又问：“杨栋梁司令员哪里去了？”杨栋梁当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程惠远：“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他们常下乡，常在下面跑。”

总理听了，笑着答道：“那好。”

接着，总理又问：“你担任了什么职务？”

“总理，我担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回答。

总理停了一下又问：“程惠远同志，你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呀？”这是很细致的问话。

“我不是地方干部，是军队干部。”程惠远很敏感地回答这个问题。

总理仍不放心地问：“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山东济南部队调来的呀？”

程惠远赶紧回答：“我不是从山东济南部队调来的，而是从北京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

总理如释重负地说：“很好，很好！”

总理停了一下严肃地指出：“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总理又问江西有无暖气，总理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小组要帮助他们。”

程惠远听到这里，深为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所感动，也敏悟到总理为什么要详细询问他的履历，这是一种怎样的信赖啊。

总理在讲完这件事后，接着又说：“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告诉你们了，你知道不知道？”

程惠远报告说：“没有。不知道。”

总理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程惠远连连表示：“总理，我这就向程政委报告。”

总理见对方已表态认真安排，确保安全，才放心地把电话放下。

透过长长的电话线，在线的另一端，站着一位怎样的智者啊！他日理万机，彻夜不眠，为着祖国的兴亡，为着人民的冷暖，为着战友的安全，一颗心为纷纭的世事而憔悴；他在逆境中发挥着超人的力量，在举国的喊杀声中争出安静的一隅，在瘫痪的国家机器中保持着一个个运转的枢纽，在真理被玷污的岁月给人以一线希望之光。

他那双布满血丝的双眼凝视着遥远的江西方向，这块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为革命贡献了儿子、丈夫的人民，他们会如何迎接为革命而受委屈的同志呢？他知道，只有人民才能实现他急切的心愿。

程惠远星夜驰婺源

江西省执行总理令

程惠远接罢周总理的长途电话，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即整理了总理的电话指示，分别送文道宏（当时任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先、陈昌奉（当时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部长）看完后，安排了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就要了一辆吉普车直接向紧靠安徽边界的婺源县奔驰而去。

婺源县位于江西东北部，距离南昌350多公里，以每小时40公里的时速计算，需八个多小时才能到。程惠远带着总理急切的叮嘱，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婺源。行至景德镇，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程惠远在招待所稍事漱洗，用过晚餐，极度的疲劳，使他无力再坐夜车，便和衣倒床睡着了。

“叮铃……”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服务员的睡梦，电话是江西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打来的，指名要程惠远接。程惠远接过听筒，一听，是中央军委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脑子一下高度紧张起来，立即驱散了疲劳。这是一个与周总理电话精神完全相反的电话。电话指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他放下电话，穿好衣服，叫醒司机，发动马达，连夜向婺源继续前进。当东方呈现鱼肚白时，吉普车才开进了婺源县委招待所。这个多雾的山区，盛产清气香醇的云雾绿茶，程惠远呼吸了几口沁人心脾的空气，精神抖擞地叩开程世清住房的门，向程世清汇报了昨天上午8时周总理给他来电话的情况，以及午夜在景德镇接到中央军委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的内容。

程世清听了程惠远的汇报，仔细看过周总理打来的电话记录后，陷入了长长思考。程世清是一个执行林彪意图颇为卖力的人物，来江西之后在全国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就是在南昌的中心，仿照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外型和规模，调动江西所有的人力物力，仅以100天的时间，平地立起一座高大建筑，其外形和质地足以与北京博物馆媲美，取名“万岁馆”，即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他曾听信下面一些人的意见，大胆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创造性”地在《伟大的会师》的油画上，把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加以突出。此刻，他心里正在急速地盘算，总理的电话十分具体，明确指示要照顾这三位老同志，而林彪的一号命令旨在暗示对这三位老同志进行迫害。他想到陈云、王震仍是中共中央委员，至于邓小平虽然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但中央尚未开除他的党籍，又慑于总理的威望，所以作了指示，由程惠远记录后向总理汇报。程世清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三人先安排在宾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住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三个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一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邓小平夫妇来后即给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程世清讲完后，又看了程惠远的记录，确认记录后，便立即程惠远吃过早饭立即驱车返南昌，连夜向总理汇报。

的核心小组的意见，看看总理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客观地说，程世清尚没有象林彪的其他追随者一样丧心病狂地迫害老干部，一方面是慑于总理的威望，一方面可能良心未泯。

10月19日，程惠远又驱车启程，于下午7时返回省革委办公大楼，吃完晚饭后，正好8时半，用机要电话直拨总理办公室，将程世清的意见向总理作了汇报。

周总理原则上同意江西的安排，但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程惠远这位抗战时期的干部，操一口河南口音，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他根据程世清的面谕，和省革委保卫部部长陈昌奉作了具体研究。根据总理的指示，决定从实际出发：（一）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厂子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改为南京军区南昌陆军学院）原校长丁是采的房子，又名“将军楼”，（二）陈云同志住南昌市青云谱江西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三）王震同志安排在东乡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并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如果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一股黑色的旋风，把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推向急流险滩，那么总理的电话则象根有力的绳索，将这些在狂风恶浪中飘摇的小舟，牵向一个个避风的小港湾。邓小平的江西之行，将会有有什么等待他呢？用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话说：“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种说法的准确性，将在本文的发展中受到挑战。

历史的偶然，把一项重大的 使命赋予一个小厂

在变革着的历史中，往往一些很偶然的因素，使得一些普通的微不足道的地方成了历史学家、各种敏感人物，以至游人所关注的中心。这些偶然的因素不外是伟人的诞生地，重要的历史战场，以及重大事件的发源地。

1985年4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谈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邓小平对姆维尼说：“你是1973年秋来中国的，我那年2月从江西回北京。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干部都打倒了，关进了牛棚，我也在江西呆了几年。”

（见《人民日报》1985年4月16日第一版）

这短短的几句话自然引起敏感人士的关注，那几年，邓小平“呆在江西”的什么地方？是如何度过的？

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位于南昌西边的望城岗，从南昌市乘车经过八一大桥，一直往西走，约莫八公里。这是一个百来人的小厂，工厂前身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拖拉机站，后来发展成为以修理拖拉机为主的厂子，生产比较正常。该厂座落在望城岗乡省庄大队的中间，与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学校毗连，相距约二华里路。这里是一片红壤丘陵，长着稀稀拉拉的松树，几幢大小不一的厂房突兀地立在山岗上。三个月前，国营江西蚕桑场从省农垦厅下放归新建县管理，这个场的党委书记罗朋是一位抗战干部，从中央公安部下放到江西，因受文革的冲击，经过批斗、学习、再教育的过程，便发配到这个百人小厂当党支部书记兼厂长。